

撥開中朝關係的迷霧

——讀沈志華《最後的「天朝」——
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1945-1976)》

●任 曉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與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朝鮮）之間的關係，被人們描繪為「山

水相連」、「唇齒相依」，中朝之間的友誼是鮮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將世代流傳下去，等等。在中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說法更是人們耳熟能詳，予人中朝並肩作戰、共同對敵的歷史印象。而中國已故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犧牲於抗美援朝的戰場並長眠於朝鮮的大地，又在人們的感情上加強了這一印象。多年間，上述話語形成了一種歷史神話。既然如此，中朝之間似乎就不存在甚麼問題了，也不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對方了。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曼妙，中朝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其實是問題多多，只不過鮮為人知而已；時間一長，連從事與朝鮮半島相關工作的政府部門和政策制訂者都不甚了了。在長期「牢不可破」的神話下，中朝之間一旦出現狀況，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們產生困惑，不知為何發生，不知如何以對，這正是目下在中國出現的情形。

多年來，中國與朝鮮之間的關係被人們描繪為「山水相連」、「唇齒相依」，在長期「牢不可破」的神話下，中朝之間一旦出現狀況，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們產生困惑，這正是目下在中國出現的情形。

一 中朝之間的矛盾

冷戰國際史是當今的一門「顯學」，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沈志華在這一領域中研究中蘇關係、朝鮮戰爭等問題多年，成就卓著，著述頗豐，其成績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公認。多半是由於他這些研究業績，2009年國家有關部門邀其對朝鮮戰爭以來的中朝關係進行一項較為細緻的研究，以弄清自那時以來中國和朝鮮究竟形成和經歷了一種甚麼樣的關係。鑒於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和自身多年的研究旨趣，沈志華經過七年的努力，寫出了《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以下簡稱《最後的「天朝」》，引用只註頁碼）這部專著。

該書除導言「還原一段歷史真相」、序篇「中朝兩黨關係的歷史淵源」、尾聲「中國改革開放與中朝關係的重構」和結語「中朝關係的恰當定位」外，按時間順序分為六章闡述，即「若即若離：同志相鄰而未相交（1945-1949）」、「朝鮮戰爭：朝鮮問題主動權轉移（1949-1953）」、「提倡主體：金日成應對各方挑戰（1953-1956）」、「懷柔政策：毛澤東全力扶植金日成（1956-1960）」、「中蘇分裂：金日成開展等距離外交（1960-1966）」和「貌合神離：毛澤東對朝政策的困境（1966-1976）」，詳細論述了中朝關係的歷史進程，填補了由於種種原因以致長期乏人問津而出現的研究空白。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任何研究都得面對資料獲取的難題，從事

中朝關係研究尤甚。探究這段歷史，劈頭就會遇到的、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獲取材料十分困難。由於中朝關係長期以來的敏感性，公開的材料十分有限，成為一個很難逾越的研究障礙，弄不好還容易碰觸「雷區」，因此被很多研究者視為畏途。此番作者敢於面對這一挑戰，迎難而上，多方搜求材料，包括中國、俄羅斯、蒙古、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已經或曾經解密的檔案，其間勞神費力的功夫和付出的艱辛，恐怕只有研究者本人才深知箇中甘苦。也正因此，沈志華這項研究所掌握的材料，比任何同類研究都要詳實。

作者基於以往對朝鮮戰爭及其前後中、蘇、朝之間互動關係的觀察，更進一步向前回溯，向後伸展，「上窮碧落下黃泉」，特別做了一項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就是對少數仍在世的當事人進行採訪。1950年代，金日成為建立個人絕對權威而數次進行黨內整肅，尤其是1956年「八月事件」後，一些遭難的「延安派」幹部逃亡中國。這些人此後命運多舛，隨着中朝關係的起伏以及中國歷次政治運動而浮沉，大都只能在北京之外的地方苟活。經過數十年，他們中有的已經告別人世，還活着的也已是風燭殘年，差不多已經被世人遺忘了。當沈志華得知在中國有這樣一些人之後，多方打聽尋找，終於尋訪到其中數人，並請這些當事人講述了當年朝鮮黨內整肅的若干情況。這些從當事人那裏直接獲取的口述歷史材料，可說是該書獨家所有，絕對

作者基於以往對朝鮮戰爭及其前後中、蘇、朝之間互動關係的觀察，尋訪到一些當事人講述當年朝鮮黨內整肅的若干情況。這些直接獲取的口述歷史材料可說是《最後的「天朝」》一書獨家所有。

是一個亮點。作者上下求索的研究精神，是應該被其他學人在學術研究中加以仿效的。

此書出版的2017年恰逢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今人評價一百年前的這場俄國革命，看法頗為分歧，比如有正統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說，有加以貶低、強調歷史偶然性的「政變」說，也有反正統而行之的「災難」說，等等，但這是一次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革命，迥無疑問，更開啟了二十世紀色彩斑斕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948年朝鮮在蘇軍的繃襪中誕生、1949年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勝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都屬於二十世紀國際共運的組成部分，與「十月革命」和蘇聯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正是在國際共運中，與多年「鮮血凝成」、「牢不可破」的話語相伴隨，中朝之間形成了一種並不正常的國家間關係。在中國，對於朝鮮只能講好話，不能講壞話，不能對其有任何批評。多年間，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與朝鮮有關的報導多半是關於其「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甚麼「成就」，或者是關於兩國重要代表團的訪問以及相應的會見、會談等。如果《人民日報》上沒有關於朝鮮的任何報導，那多半是因為中朝關係出現惡化或陷入了低谷。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度有所擴大，較之過去，人們逐漸有了更大的發表意見（包括學術觀點）空間。然而，一旦有批評朝鮮的看法見於媒體，朝鮮駐華使館例必向中方提出交涉。由

於思想上一貫的束縛和中朝間長期以來形成的不正常關係，中方有關部門常對國內的媒體或學者加以批評或阻止，實際上是對朝鮮讓步。這一行為模式根深蒂固，貫穿了整個中朝關係互動的過程。2004年，中國頗有影響的《戰略與管理》雜誌因刊登了一篇內含批評「金氏王朝」等語的文章而受處理，被迫停刊，就是很典型的一例。《環球時報》也曾因刊發與朝鮮有關的署名評論文章而受到來自朝鮮方面的壓力。

在中國，由於多年間只能對於朝鮮說好話不能說壞話，人們實際上對中朝關係不明就裏，或不知其來龍去脈，一旦有事或雙方關係出現問題，便會不明究竟，如墜五里霧中。在這一意義上，《最後的「天朝」》一書還原了1945至1976年間中朝關係的發展脈絡，弄清了歷史真相，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從事與朝鮮半島有關工作的人士，都非常值得一讀。不了解中朝關係歷史演進的過程，就無法很好地理解中朝之間的種種問題，對於政策制訂者來說，就難以相應地制訂有效的對策。進而言之，如果讓更廣泛的中國普通讀者也能讀到此書，或許能在這一問題上起到開啟「民智」的作用。

二 意識形態之結

冷戰年代，中國與朝鮮、越南和阿爾巴尼亞都曾經形成過所謂「同志加兄弟」的關係。所謂「同志」，是因為它們在意識形態上都信奉其

中朝之間形成了一種並不正常的國家間關係。在中國，對於朝鮮只能講好話，不能講壞話，人們實際上對中朝關係不明就裏。《最後的「天朝」》還原了1945至1976年間中朝關係的發展脈絡。

所理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謂「兄弟」，是指它們血脈相連的關係。儘管曾是一度大加宣揚、極度高調的「同志加兄弟」，但到了1970年代後期，中越關係和中阿關係都走向了破裂，中越之間還發生了一場戰爭，中國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至今後遺症尤存。

基於以往的歷史經驗，今天中國與朝鮮出現類似於當年中越關係和中阿關係的破裂結局和反目成仇，不是不可想像的。應該說，也許正是因為這所謂的「同志加兄弟」關係，才出現了這樣的反目成仇。原因在於，這一關係是一種在國際共運內部、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關係，而不是建立在主權原則基礎上的現代國家間關係。這二者間存在着內在的衝突：「工人無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一種以階級為紐帶的、超越國家界線的思想和理想。歷史已經證明，這種理想也許難以實現。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關係，表面上看似「牢不可破」，但卻是一時的，實際上不可能「萬古長青」。一旦在意識形態上出現裂痕和分歧，這一關係的基礎便可能崩塌。中蘇關係從同盟走向破裂乃至視對方為「最危險的敵人」，正是如此。這種基於階級觀念建立起來的關係甚至影響到中朝兩個鄰國之間邊界的劃定，而且影響頗為重大。

中國與朝鮮之間，本來就沒有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和領土爭議。按照自然地形走向，圖們江和鴨綠江形成為兩國的界河，剩下的只是作為兩江發源地的長白山及山頂的

天池的領土歸屬問題。按照1909年的《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即《間島條約》），長白山天池及周邊群峰均在中國境內。這是中朝劃界相當重要的一個條約，結束了近二百年的界務爭議和交涉，但是《最後的「天朝」》對此條約的交代和闡述似乎過於簡要了些（頁522-23），稍感可惜。

及至1962年，中朝兩國簽訂了《中朝邊界條約》及相關文件，但兩國政府始終沒有公布這一條約及相關文件（頁537-38）。《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包羅甚詳，卻唯獨沒有這一條約，其中必有緣故，不外乎三種可能：一是中國不願意公布，二是朝鮮不願意公布，三是雙方都不願意公布。究竟是朝鮮得了大便宜、樂不可支不願公開？還是中國顧慮國內反應而沒有公開？抑或是兩國之間商定不公布？作者通過深入分析，認為大致可以判定，中國的當政者當時是不願意公布這個條約的。朝鮮或許也不願意，但無法否認的是，朝鮮領導人對於在中朝邊界談判中所獲得的實際利益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對此十分滿意（頁545-46）。

直到2000年，上述條約及相關文件才被「公布」於眾，而公布者既非中國，也非朝鮮；並非出自政府，而是出自作為韓國三大報之一的《中央日報》。《中央日報》所根據的是1974年6月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外事辦公室編印的《中朝、中蘇、中蒙有關條約、協定、議定書彙編》一書。沈志華將韓國方面出版的涉及《中朝邊界條約》和文件的韓文本與中國已出版的相關檔案文

「同志加兄弟」關係是一種在國際共運內部、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關係，而不是建立在主權原則基礎上的現代國家間關係。這二者間存在着內在的衝突。

件、資料逐一進行對照後，大致斷定在韓國出現的吉林省外辦的文件彙編是真實的，韓文本有關《中朝邊界條約》等文件也是可信的（頁541）。根據條約及議定書，原本屬於中國的長白山主峰白頭峰（朝鮮稱「將軍峰」）和圖們江江源地區大片領土劃給了朝鮮，位於中國境內的長白山主峰以北9.8平方公里的天池，54.5%歸屬了朝鮮，而中國擁有的面積只佔45.5%（頁543）。至於圖們江江源地區，從1909年的《間島條約》到1962年的《中朝邊界條約》，按照地圖比例尺估算，中國出讓的領土大約在500平方公里左右。難怪朝鮮方面多次表示對這一條約及依此進行的劃界「非常滿意」（頁546-47）。

作者分析，之所以出現如此的情況，在朝鮮方面是因為看到了中國面臨國內外各種困難，故而看準時機，提出簽訂邊界條約。在中國方面則是在中蘇鬧翻的形勢下，為了在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擺脫孤立，力求得到朝鮮勞動黨的支持，因而在領土邊界問題上滿足朝方要求，以領土換取朝鮮的歡心和支持。書中指出，「中蘇分歧公開化以後，各國共產黨大多站在蘇共一邊。中共急於擺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孤立地位，積極組織左派隊伍，特別是中國周邊的朝鮮、越南和日本共產黨。蘇聯憑藉其實力可以靠經濟援助吸引朝鮮，而中國當時正陷入經濟困境，自顧不暇。而朝鮮恰恰在此時提出要解決邊界問題」（頁548），於是中國「被迫」如上行事。

然而，《中朝邊界條約》簽訂後，朝鮮對中國的政治支持僅僅維持了三年，到1966年，由於蘇聯對朝政策趨熱和中國文化大革命展開，中朝關係開始惡化，乃至跌入深淵。這段歷史的教訓十分深刻：一國的政治態度和政策是說變就變的，而領土的失去卻可能是永久性的。

為甚麼當時的中國領導層會輕易地（在今天看來是草率地）在國家領土主權問題上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讓步，並且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談判、測量、劃界等一系列工作呢？作者分析道，中國領導人尤其是作為決策者的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做，是中國傳統的「天朝」觀念和「世界革命」思想使然。當毛澤東把「天朝」觀念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理想融為一體時，就導致了在領土和邊界問題上的如此做法（頁548-49）。作者「設身處地」，體會其中內涵：「對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或亞洲革命陣營）而言，邊界從來不是問題，甚至不存在；只要歸順『天朝』，給你再多的疆土也沒關係，因為你本身就是屬於『天朝』的。」（頁549）這種「天朝」觀念及相關的做法，已經隨着毛澤東1976年離世而終結，這也是書名「最後的『天朝』」的由來，可說意味深長，發人深思。

那麼，作為對外政策次要決策者和主要執行者的周恩來又怎麼想呢？作者轉引了1963年6月28日周恩來接見朝鮮科學院代表團時的談話（頁539、587，註313）。在我看到的這一談話文件中，周恩來在

當毛澤東把「天朝」觀念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理想融為一體時，就導致了在國家領土主權問題上對朝鮮作出重大讓步，以領土換取朝鮮的歡心和支持。

中國的政策制訂者錯誤地以出讓自己手中的領土為代價，以換取國際共運意識形態分歧鬥爭中朝鮮不可靠的「支持」，這是中國在外交上的一大失誤。

朝鮮代表團面前對中國歷代統治者大加撻伐^①：

秦、漢以後，更加經常地從關內到遼河流域征伐了，那更是侵略，隨着用兵失敗而歸。唐朝也打過敗仗，但也欺侮了你們。那時，你們有一個將軍把我們的侵略軍隊打敗了，打得好。……滿族統治者把你們越擠越往東，擠到鴨綠江、圖們江以東。……我們要替祖先向你們道歉，把你們的地方擠得太小了。我們住的地方大了。

領土邊界從來都是歷史地形成的，中國與朝鮮的邊界亦然。二十世紀的國家領導人如此罵老祖宗又所為何來？是為了表現中國的大度？抑或是作為共產黨人與歷代統治者不同？

除了書中引用的講話外，周恩來還說，「我們是把你們看成是我們的前線，不僅是中國的前線，而且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前哨。你們應該把中國看成是你們的後方，特別是東北，更是你們近距離的後方」^②。很明顯，這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階級觀點使然。

作為大外交家的周恩來，對於中朝劃界的細節在當時是如何考慮的？由於有關檔案尚未公布，目前難以細述。但今人大體能夠推想出來，毛和周都是從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中成長起來的領導人，在根本理念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區別只在於毛具有更多革命家的浪漫情懷，周更多地具有實幹家的務實精神。如果出於「工人無祖國」，而且真心覺得「把你們的地方擠得太小了」，

那麼把一片領土劃給對方似乎是自然和符合邏輯的。然而事實是，本來根據兩國間的條約很清楚屬於中國的領土，結果卻出於某種考慮或需要竟劃給了朝鮮。

因此之故，我不太同意作者所說中國是「被迫割讓」長白山主峰和天池（頁539），以及與此有關的「只能」、「無奈」等表述，因為在當時，中國並不是非如此不可的。為了獲得朝鮮易變的「政治支持」，本來還可採取別的辦法和方式，並非只能通過拱手出讓領土來實現。在外交中，是否同意談判本身就可以作為一個籌碼，而是否讓步以及在何處作出多大程度的讓步，均大有文章可做，無需操之過急。所謂的「支持」，事實上不過是一種主觀的態度、行為上的「表態」而已，本來就是一時的、說變就變，歷史事實也證明確是如此。所以，當今天再回看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明白，事情的實質是當時中國的政策制訂者錯誤地以出讓自己手中的領土為代價，以換取國際共運意識形態分歧鬥爭中朝鮮不可靠的「支持」，這是中國在外交上的一大失誤。

三 從盟友到「怨侶」

中朝之間，在表面的友好背後，實際上是關係的冷暖無常，不斷出現反覆，歷多年而演變成為今日的「怨侶」。儘管中國對朝鮮百般遷就，不斷提供各種援助，甚至到了予取予求的地步，然而，朝鮮方面的不滿和怨恨仍在累積着，往後至少有三件大事足以使朝鮮對中國

產生怨恨，此即書中提到的中美和解、以及我認為的中韓建交和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其結果是中朝愈來愈分道揚鑣。

作者分析，中美和解是冷戰時期震驚世界的一個重大事件。就中國方面而言，從1950年代末中蘇裂痕不斷擴大至1960年代公開大論戰，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認定蘇聯已成為「修正主義」國家。隨着兩黨關係破裂而來的是國家間關係的破裂，中蘇同盟名存實亡。由此，中國將蘇聯視為威脅，尤其是當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這種威脅似乎變得迫在眉睫。而此時，中美互為敵人已達二十年之久，這種關係仍在延續。在與兩個世界超級大國都鬧得不可開交的狀況下，外部環境對中國極為不利。「窮則思變」，毛澤東要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研討國際局勢並提出建議，周恩來對此加以落實。四老帥經過認真研議，分析了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的局面，提出了戰略性的意見和建議。陳毅並以口頭方式，向中央提出了恢復中美會談、打開中美關係的建議^③。經過1971年「乒乓外交」的試探摸底，經由曲折的外交渠道輾轉傳遞信息，加上巴基斯坦的協助，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於1971年7月秘密訪華。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④。

中國作出這一戰略性的轉變是具有充分理由和必要性的，此舉具有重大意義，為日後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必備條件。中國作出如此重大的轉變，必須使「一條戰壕裏的戰友」信服這樣做的必要性，同時努力維護這些「戰友」的利益。然而這又很困難，越南就因難以接受中國對外戰略從「抗美」到「聯美」的急劇轉變而產生怨恨^⑤。在越南戰爭尚在進行時，中國與原本共同的敵人握手言和，這似乎表明了中國的背叛。至於朝鮮的態度又如何呢？《最後的「天朝」》寫道：「無論如何，在金日成看來，中國正在與自己的敵人拉拉扯扯。儘管不像越南和阿爾巴尼亞那樣採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但朝鮮內心存在的恐懼和擔憂是無法消除的。」(頁646)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各國發生劇變，世界格局出現大幅震盪。劇變後的東歐國家紛紛與韓國建交，最終蘇聯也與韓國建交。在這一變局下，中國與韓國建交也是大勢所趨，只不過是時間早晚問題。但中國為了顧全朝鮮的面子，盡可能放緩腳步，先是在漢城(今首爾)建立了貿易代表處，並促成朝鮮與韓國於1991年9月同時加入聯合國^⑥。為求得朝鮮方面對中韓建交的理解，中方還曾派外長錢其琛專程訪朝與朝方溝通^⑦，如此等等，一直到1992年8月中國才與韓國正式建交。我認為，儘管中國處處照顧，每一步都向朝方充分通報情況，但中韓建交對朝鮮畢竟是一個打擊，心理上不可能不留下陰影。

中朝之間，在表面的友好背後，是關係的冷暖無常。至少有三件大事足以使朝鮮對中國產生怨恨，此即中美和解、中韓建交以及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其結果是中朝愈來愈分道揚鑣。

改革開放時代，周邊和平與安定是中國的根本利益考量，而朝核開發引起危機和緊張，與中國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中朝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的重大利益是相悖的。

到1990年代，在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競賽中，北方實際已經落敗，生存已經凸顯為朝鮮的頭號問題。同時，經濟的破敗勢必導致軍事的落後。在這一情勢下，朝鮮決心劍走偏鋒，運用不對稱戰略，建立核計劃、開發核武器以求生存和安全，朝鮮核問題由是產生。改革開放時代，周邊和平與安定是中國的根本利益考量，而朝核開發引起危機和緊張，與中國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朝鮮半島一旦有事，中國必受影響，東北更是首當其衝。因此，朝鮮半島無核化關乎中國的重大利益，中國努力謀求促進半島無核化；相反，朝鮮則視核、導開發為根本利益。由此可見，中朝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的重大利益是相悖的。從這一意義上說，中朝關係的冷暖無常還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中朝在重大利益上日益分歧，兩國之間早已漸行漸遠。

四 餘論

2017年5月3日，朝鮮中央通訊社播發一篇評論〈不要再做亂砍朝中關係支柱的危險的言行〉，第一次點名批評中國。過去，朝鮮對中國指桑罵槐，次數已經不少。例如，2013年，原朝鮮領導層成員、金正恩的姑父張成澤被整肅並從肉體上加以消滅，說他「出賣」朝鮮的利益，出賣給誰呢？只能是指中國，只差沒有點名。這一次則是點名批中國。朝中社的評論稱，中國官方媒體刊登多篇有關朝核問題的文章是「事理不分」，構成了「對朝

鮮自主合法權利和尊嚴的侵害」。該文連續使用「卑鄙做法」、「極為挑釁的妄言」、「露骨的威脅」、「嚴重侵害」等話語批評中國，稱「中國倒是應當老實承認長達70多年在反美對抗戰的第一線艱苦作戰，挫敗美國的侵略陰謀，為維護中國大陸〔暗示還有一個台灣〕的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的到底是誰，先向朝鮮表示感謝才合乎道理」^⑥。顯然，這是早已過時的邏輯，殊不知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了！

還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評論署名為「金哲」，即2017年2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被謀殺的金正恩同父異母兄弟金正男的護照名字。金正男多年間生活於澳門，實際上處於中國的保護之下，如今一朝喪命，平壤難逃干係自不在話下，而這一事件發生後心理上震動最大的，無疑是中國。

針對朝鮮官方通訊社的這篇評論，5月5日，中國方面以《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俠客島」的文章作答，該文題為〈朝中社，你批評中國的言論很無理〉，指出：「現在，朝鮮以核武器為界線，反對朝核的，就是朝鮮的敵人，支持的就是朋友。從這個角度說，朝鮮已經沒有朋友，為了核武器而與全世界為敵。」針對朝中社評論稱中國應該支持和滿足朝鮮的所有要求，並且應該「感謝朝鮮」，該文指出，「這完全是對中朝關係乃至東北亞格局的顛倒。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統一半島，半島怎麼會爆發戰爭？中國捲入其中，付出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引發了中美長達20年的對抗，甚至使兩岸問題擱置至

今，中國承擔了朝鮮當年『任性』與妄動的大部分成本」。現在，「朝鮮以『無友』姿態四處亂咬，將自己置於中國的對立面，放任中朝關係沿着『友好—正常—對抗』的軌道滑落」。「朝鮮沒有走出冷戰，也不願意走出來，在敵我對抗思維中『作繭自縛』，而且還指責或者憤恨中國」。文章的結論是：「中朝已經不是『傳統』友好，需要新的時代精神上重新界定雙邊關係。」^⑨

這篇文章直指問題的本質——中朝關係需要「重新界定」。這是經過多年的困惑、搖擺和徘徊後終於得出的頭腦清醒的結論。這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個甚麼樣的國家？從事實看，可謂劣迹斑斑。早在1983年，朝鮮為了謀害韓國總統全斗煥，在緬甸首都仰光製造了炸彈爆炸事件，導致韓國多名官員遇難，也致使緬甸與其斷絕外交關係。1987年，朝鮮為了破壞將於韓國舉行的漢城奧運會，派遣兩名特工在大韓航空858航班上放置炸彈炸毀了客機，致機上115人無一倖免於難。兩名朝鮮特工中途下機，其中一人即金賢姬自殺未成，後來徹底懺悔並向世人公開了真相。金正日還在世時，承認了朝鮮曾在日本國土上綁架日本人並將他們帶往朝鮮。2013年，朝鮮政權又殘忍地處決了張成澤。再加上2017年金正男遇害……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更不用說金氏三代世襲，淪為世界笑柄。產生這樣的「怪胎」，實在是國際共運的悲劇。

回過頭看，在今天的中國，出於意識形態的對朝感情在多年間已

經消磨殆盡，剩下的只不過是出於地緣政治安寧的考慮罷了。中朝關係的這一演變，是很值得深究的，由此可以釐清不少問題。《最後的「天朝」》一書弄清和寫出了中朝關係的歷史，對於人們理解和把握中朝關係的今天和明天，具有很大助益，因此是一部重要的專著。而毛澤東之後的中朝關係，也需要有人續寫下去。

註釋

①② 〈周恩來總理談中朝關係〉，《外事工作通報》，1963年第10期，頁2：5。

③④ 參見熊向暉：《歷史的註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頁203-204；202。

⑤ 參見潘一寧：〈越南戰爭後期中越關係的演變（1968-1972）〉，《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3期，頁91-99。

⑥ 以往，朝鮮擔心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會固化朝鮮半島的分裂，因而長期持反對立場。

⑦ 詳盡的記述參見錢其琛：〈外交十記之五 通往漢城〉，載《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137-62。

⑧ 金哲：〈不要再做亂砍朝中關係支柱的危險的言行〉，搜狐網，www.sohu.com/a/138749252_790610。

⑨ 參見〈朝中社，你批評中國的言論很無理〉，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a/20170505/51047069_0.shtml。

在今天的中國，出於意識形態的對朝感情在多年間已經消磨殆盡。《最後的「天朝」》一書弄清和寫出了中朝關係的歷史，對於人們理解和把握中朝關係的今天和明天，具有很大助益。

任曉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